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 卢毅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学说便已被介绍到中国,但这种介绍是零星的、片面的和不成熟的,存在着不少误解和歪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真正传播马克思主义。从1918年起,李大钊接连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等人的大力倡导之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国各地出现了一大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十月革命后最早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刊物是《新青年》,仅在1921年之前就发表了一百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先后出版了“马克思研究”“劳动节纪念”“俄罗斯研究”等专号,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也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陆续刊载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国际一大宣言的译文,以及一些介绍马克思、列宁等人生平和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材料。同时,《国民》杂志也先后刊登《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马克思主义论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译文,还发表了《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组织》《苏维埃俄国的新农制度》等介绍苏俄建设情况的文章。此外,全国还有许多报刊大量刊登宣传、研究和评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当时全国报刊多达400余种,它们虽然立场观点不一,但几乎无一不谈马克思主义。时人即曾描述:“譬如社会主义,近來似觉成了一种口头禅;杂志报章,鼓吹不遗余力”,“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力万马奔腾之势……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

第二,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在北京,李大钊1918年就在北大组织过一个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1920年3月,他又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今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罗章龙等人组成,并建立了一个名叫“亢慕义斋”(“亢慕义”为英文Communism的音译,意为

“共产主义”)的图书室,收集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供会员使用。同年12月,李大钊又组织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以编译社会主义丛书和举办演讲为主要活动内容。在上海,陈独秀1920年5月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核心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杨明斋等人。在湖南,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早在五四运动前就组织了新民学会,出版《湘江评论》,探讨改造社会的问题,并发表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我们应该起而仿效”。1920年夏,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后,立即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创办文化书社,这是一个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革命团体。在武汉,恽代英等人1920年2月组织了利群书社,后又与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建立了共存社,主要销售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在天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先进分子1919年创办了觉悟社,出版《觉悟》,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济南,一些进步分子1919年冬开办了齐鲁报社,次年改为齐鲁书社,公开推销各地进步书刊,并发行《十日》刊,介绍马克思主义读物。1920年初,邓恩铭等人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开始有组织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第三,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杨匏安1919年底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差不多同时问世,这是华南地区最早完整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不久,他又撰写了《马克思主义浅说》,进一步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此期间,李达也精心翻译了包含马克思主义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三部著作,即《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李汉俊亦先后发表了数十篇译文,热情介绍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陈望道更在1920年8月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使国人第一次看到这份共产主义运动文献的全貌。在此前后,《雇佣劳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自序》也分别刊载于报刊或以单行本出版。列宁的《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与政治》《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以及《伟大的创举》《国家与革命》的一部分都译成中文发表。以上马列原著的翻译发表,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当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争论过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时并存的还有其他各种主义,诸如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即使同样都标榜“社会主义”,其中也存在着差异。瞿秋白当时便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与这些思潮竞相传播,不可避免要开展辩论。1919年到1923年,马克思主义与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三次论战,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人们的认识。这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反复推求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从而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摘自2011年第11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原标题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纪事》)



《北行漫记》里的陕甘宁边区

□ 李庆刚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一直对陕北采取军事和新闻封锁,诋毁共产党的抗战功绩和中伤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这反而引起了一些新闻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对共产党的浓厚兴趣。这些新闻记者多半既非共产党,也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身为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的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与国民党当局的交涉,1944年6月,他随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达延安及华北抗日根据地地进行战地采访。其间,他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叶剑英、王震、吕正操等人,对中共领袖和将领的访问,使他了解了延安的真实情况,从而对国民党宣传的虚假性感到厌恶。不等离开延安,福尔曼当众表示,他要把所见到的一切,毫无顾忌地告诉全世界。

1945年福尔曼回国后便急不可待地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又译为《北行漫记》)一书。这部作品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抗战圣地延安,报道了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及艰苦卓绝、英勇抗日的八路军,被誉为是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的姊妹篇。

“毛泽东在延安并不是什么不可接近的神灵,也不是所有智慧和指导思想的唯一源泉,他的话也不是不可置疑的法律”。福尔曼在《北行漫记》写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在福尔曼眼里,毛泽东朴实得和普通的老百姓并无两样,他的会客室是一个有着简单砖地、白墙壁,有着笨重粗糙家具的窑洞。在暗夜的窑洞里,唯一照明的火光,是一支安在翻转杆子上的蜡烛。招待客人的是淡茶、土制糖果和香烟。福尔曼描写道:小孩子在大人们谈话的全部时间中进进出出。他们会立下来,注视客人几分钟,随后抢了一块糖,飞跑出去。毛泽东对他们不加注意。通过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毛泽东,福尔曼得出这



样的判断:“毛泽东在延安并不是什么不可接近的神灵,也不是所有智慧和指导思想的唯一源泉,他的话也不是不可置疑的法律。不可否认,毛的观点和建议对政策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但这些都只被看作是为共产党领导成员讨论和最终批准的基础,而这些领导人决不是些人云亦云的人。因此,毛公开发表言论前,先要经过仔细的构思,然后得到他党内同事的修改。这样,最后的定稿是党委集体的意见,不只代表毛个人的观点。”

“关于人民内心怎么看待共产党的问题,民兵作出了最概括的回答”。福尔曼发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赢得了人民的支持。福尔曼是从民兵武装来认识这个问题的。他指出:“220万民兵是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抗日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共产党武装起来的人民。在我看来,关于人民内心怎么看待共产党的问题,民兵作出了最概括的回答,因为武装起来的人民不可能长期容忍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府和一支强加的军队。这是举世公理。”福尔曼还向八路军总

司令朱德问到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如何解决分歧的问题。朱德认真回答说:“我们不愿意考虑中国的内战,我们当然也不会挑起这样的战争。……国民党如果企图重开内战,那么这场战争便不仅仅是对付共产党,而且是对付全中国人民,因为人民站在我们一边,他们是向全中国人民宣战。”当谈到蒋介石时,朱德回答:如果他继续压制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民主力量,甚至不惜冒内战的危险,那么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其他军队这样大规模地开展过生产,这毫无疑问也是造成军民间神奇合作的最重要的因素”。福尔曼还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对于八路军参加大生产运动,福尔曼感到新奇。他指出:“生产运动不只是在老百姓中开展,部队也参加了。这或许可以说是八路军的特色。据我所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其他军队这样大规模地开展过生产,这毫无疑问也是造成军民间神奇合作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我所知道

的,任何接触过八路军的人都不会怀疑,正是与人民的这种鱼水之情,才使得八路军在这场缴获或土造的武器进行的战斗中,能坚持下来。”当福尔曼对一群八路军军官提出,如果重庆发动一次新的“围剿”,驻扎在紧挨国民党统治区的边区的5万云集农民与士兵于一身的八路军战士,可能无力抵御胡宗南50万中央军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齐声说:“够啦!够啦!”他们补充说,“人民和我们在一起”。朱德还给福尔曼指出了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军队的不同:我们知道自己为何而战,“遗憾的是,被国民党强行征来的大多数士兵,至少在目前还只是模模糊糊知道为何而战。很明显,这就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一再受挫。但我们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战士们则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是人民的战士,受到人民的支持。我们的战士有主动性,有作战能力”。百闻不如一见。根据地的所见所闻使得福尔曼豁然开朗。1944年9月21日,福尔曼在晋绥汾阳前线的八分区司令部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了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亡,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亡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的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现在最好的一个证明,即你们都有武器,如果人民怕八路军,或八路军怕人民,八路军就不会给人民枪支。这次参观使我最受感动的,是人民都武装起来了。”“在中国已证明了光武器还不是要紧的东西,精神更重要。这奋斗的精神与武器结合起来就是最大的力量”。最后,他和其他记者们一齐高呼:“八路军、游击队、民兵、老百姓万岁!”就这样,福尔曼在《北行漫记》中告诉美国人民,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

(摘自2011年6月27日《北京日报》)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故事

□ 史进平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指示工作人员把会场上原与马恩列斯并列的毛泽东、朱德画像摘下来。对此,毛泽东向党内同志解释说:“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义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他还说:“如再搞一个主义,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

好。”那次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全会立下了六条规定:一不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鼓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

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信香港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信中写道:“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在给陈嘉庚的信中说:“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在给司徒美堂先生

信中:“至盼先生摒档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对于这些民主人士,毛泽东用了几个极为谦逊的词,如“弟”“予以指教”“并祈赐复”“至盼”等,谦虚之情跃然纸上。

1949年6月,毛泽东再次诚邀宋庆龄,写道:“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榷,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信中的谦词——“违教”“仰望”“趋前致候”“敬希命驾”“就近请教”“至祈勿

却为盼”等,字字彰显出毛泽东为人的谦恭和对革命事业的孜孜以求。谦虚是一种品格,一种姿态,一种风度,一种修养,一种胸襟,一种谋略,更是一种智慧。从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谦虚风范可以看出,“谦虚”,蕴涵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理想、宗旨、奋斗目标和作风风范等极为丰富的时代要求,开拓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走向执政地位的新视野和新境界。(摘自2015年第2期《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原标题为:《谦虚——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执政智慧》)

米缸的故事

□ 吴钱妹

在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口古铜色陶质米缸,高61厘米,腹围167.7厘米,口径36厘米,底径27厘米;鼓腹、曲径、圆口、竖条花纹。历经90多年的岁月洗礼,米缸已然陈旧斑驳,外面还留下了一条狭长的裂痕。它是人民子弟兵自觉遵守群众纪律、维护群众利益的见证。

故事要追溯到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当时,敌人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物资极度匮乏,战士们常常食不果腹。1927年9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的途中驻扎在莲花县的甘家村,村里的老百姓不知道来了什么兵,以为是军阀来了,便四处东躲西藏。

工农革命军进村时一个老乡也找不到。这时,部队已经断粮,战士们又累又饿,疲惫不堪。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突然听见村子西头传来了炊事员兴奋的叫喊声,“班长,快来呀,我找到粮食了!”原来在一间破陋的矮房墙角,发现了一口古铜色的米缸,装着半缸白花花的大米。按说没见到老乡本人就拿走人家的东西是

违反纪律,但想到瘦得皮包骨头的战友们,炊事班班长心酸不已,犹豫不决。最终,为解决燃眉之急,只得把老乡家里的半缸米做成了饭,让战士们先填饱肚子。当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狠狠地批评了炊事班班长,严肃申明革命纪律,并责令部队务必照价赔偿。因为没有那么多银元,部队临时留下了一封诚挚的道歉信,并卷好一床棉絮放在米缸里用来抵米钱。

待部队离开后,米缸的主人陈娇枝回到家里,发现家里半缸的米没有了,米缸里塞了一床棉絮和的一封信,信上写着:“老乡对不起,我们到你家时找不到人,吃了米缸的米,留下一床棉絮作为补偿,请收下。”从此,这口米缸成了陈家的传家宝。新中国成立后,陈家生活条件好了,添了新家具,唯独这口缸没有舍得换,几十年过去了,缸裂了个缝,陈娇枝用桐油掺石灰补了补还在用。1969年,陈娇枝将这口米缸捐赠给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人民子弟兵自觉遵守群众纪律的动人故事,在甘家村世代流传下来。

(摘自2019年3月2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反中国贪污共党的第一个文件

□ 苗体君

1927年4月27日,王复元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会后,中央让他带回拨给山东党组织的活动经费1000元,而王复元谎称巨款在途中被窃,竟将这笔巨款据为己有。随后,王复元利用担任山东党组织重要职务之便,多次贪污公款。1928年4月,他以去上海与党组织联系工作为由,从直属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关印刚部的集成石印局拿走2000元资金,而当时石印局承担印刷山东党内刊物《红星》及党的文件与宣传材料的重任,最终石印局因经济困难而被迫停业。

王复元贪污党费的丑事,被中共一大代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及时发现,邓恩铭对他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早在1926年8月,中央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也是中共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专门性文件。通告说:“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形。”“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留情地清理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依据中央的文件,邓恩铭将

王复元开除出党,邓恩铭成了中共历史上反贪第一人,王复元也成为中共历史上因贪污而被开除出党的第一人。(摘自2013年第1期《文史天地》,原标题《中央特科处决出卖邓恩铭的叛徒始末》)